◆观 点

农民市民化要靠“在地化”

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首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

一是社会关联的建立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因为，外来人口基本上没有实现在地化，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具有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正的社会联系。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持一种“渐进策略”，注意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二是就业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只有将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纳入到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三是社区感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在地化。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所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入门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入城就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了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占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在此情形下的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总之，从在地化的视角切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社会，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之上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2015年4月2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田毅鹏 胡水）

粮仓“硕鼠”无食我黍

粮库和粮商相互勾结，以陈粮顶替新粮赚取差价，是我国粮食系统内部长期存在的一种“套利”模式。陈粮变新粮，在业界早已不是秘密，此前就有所谓的“转圈粮”——粮库让企业“帮助”买下库内的陈粮，之后粮库把陈粮当新粮买回，粮食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粮库，原地转了个圈后，便为粮库带来一笔不菲的财政补贴收入。此次发生在辽宁、吉林两地的以陈顶新事件，粮食已经不再原地转圈了，而是有了真实的流转，两地的做法和以往的“转圈粮”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转圈粮”骗取的补贴基本落入单位的小金库，而此次事件中，巨额差价补贴极有可能落入了个人的腰包。此次陈粮变新粮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单位违法违纪，变成有粮库负责人亲属参与、内外勾结涉及贪腐的违法犯罪行为。

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次辽宁、吉林两地出事的粮库隶属于中储粮，作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中储粮对此难辞其咎。2013年10月，长期以来问题多多的中储粮完成了高层管理团队大换血，新的董事长、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走马上任，新领导班子对“转圈粮”、擅自动用储备库存、压级压价和抬级抬价收购、设立小金库等行业内的“四害”行为进行了大范围查处。然而，此次发生在辽、吉两地的以陈顶新事件，相比以往的“转圈粮”现象更为恶劣，这一现实情况令人深思。这次以陈顶新事件表明，“硕鼠”每时每刻都觊觎着粮仓里的美味，并不时变换、更新着盗窃手法，这是对中储粮高层的考验，进而言之也是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考验。

国家粮食局此次下发紧急通知，决定对国字号“粮仓”开展一次重点检查，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散发霉味、质量难保的陈粮，如果真的摆上餐桌，势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局必须及时排查，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在对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企业的检查中，粮食主管部门还要摸清家底，守住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

中储粮近年来的违法违纪问题，多发于执行国家储备粮库“托市收购”政策的过程中，此次发生在辽、吉两地的以陈顶新事件就是其中一例。造成中储粮问题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性收储中的工作权责已远超出中储粮的实际能力，由此造成所谓“小马拉大车”的力不从心局面。由于系统内的收储能力不足，中储粮必须委托地方粮食企业开展收储，近年来政策性收储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粮企也越来越多。然而，中储粮对各路“加盟”粮库，既管不了人事，也不管住财务，“硕鼠”乱窜也就难以避免了。

以陈粮顶新粮等存在于我国粮储体系内的乱象，与机制不顺畅、制度不健全有关，更与有关部门管理缺失、监管不严有关。捋顺机制、改革制度需要一个过程，但扎紧粮仓、严查“硕鼠”却是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发生在辽、吉两地的以陈粮顶新粮案件，肯定不会是孤立的个案，人们期待有更多“搬仓鼠”落网。（2015年4月22日《北京青年报》樊大彧）

◆纵 横

城市中的新鲜血液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智慧城市发展联盟理事长李铁4月18日在2015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有一个特别大的认识误区，他们一直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实，他们忘记了，这是城市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鲜血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观点。

不过，如果要把话说透，首先就要确认“外来人口”是一个极其错误、开历史倒车的概念。所谓“外来人口”，在人口总量中国际移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度，不过指的就是国内人口，是把地区间的流动、迁徙人口视作了“外来人口”。在理应是自由迁徙的现代社会，在一国之内使用“外来人口”这样一个宏观评价概念，其内在的精神是蒙昧主义的。

尽管中国有2000多年大一统意识，但也始终存在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在1949年以前，地方主义是跟乡土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处。1949年以后，地方主义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可以说扫荡，但由于新的户口制度的建立，人的身份的地方化又前所未有地被强化，整个国家在极其深刻而又前所未有地发生板块化。所谓“外来人口”，正是由这种板块化运动所引发出的一种观念。

当中国还处于古典的地方主义文化中时，一方面家乡观念牢固地限制了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人口迁徙又是自由的。在人口自由迁徙当中，在黄河、长江流域有“外来户”观念，但这种观念只存在于村落、乡镇这样的社会底层当中，一般而言，到了县、府层面的“宏观”水平就没有了“外来户”观念。在东北等北方边疆，汉族的所谓“外来户”指的仅仅是后来者。宏观层次有一个从华东至西南的中国南部地区的“客家”概念，是指南迁汉族人口中的一个大支。即使有一个这样的宏观概念，也是多么清晰地以“客”相称，当中不仅毫无歧视，而且更是突出了对这部分人口的特别尊重。“客家人”比之今天所谓的“外来人口”，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充满羞愧。

人类总爱家乡，这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也是实在的利益，因为对家乡的熟悉意味着生存的经验和适合性。迁徙无非三种原因：一是工作、婚姻等的需要；二是对比家乡更有利于生存的目标追求；三是因灾变而不得已。因此，人口的迁徙未必一定会令被迁徙地获得发展，但是，考察人类历史，可以认为：凡是发展了的地区，一定是人口迁徙进入的结果。有西亚人口的迁入，才有了古希腊的辉煌；有欧洲大陆人口的迁入，才有了英伦三岛的崛起；有旧大陆人口的迁入，才有了美洲大陆的新文明；有了潮水般的闯关东，才有了清朝晚期以后东北地区的富饶。如果仔细分析，可以举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可以适合于一切繁荣或曾经繁荣过的地区。总之，没有人口迁入，一定不会有发展，尤其对于后发展来说更是一种常规。（2015年4月21日《南方都市报》顾则徐）

◆史海钩沉

刘安世：北宋最后一位谏官

北宋后期，党争不断，士风凋零，蔡京、童贯之徒皆以见风使舵、吹牛拍马走上权力巅峰。但有一个坚持说直话的谏官，他就是刘安世。

不说假话不打妄语

刘安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刘航任过地方官吏和外交使节。1073年，刘安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进士，但拒绝了朝廷的任免，拜当时退居于洛阳、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为师，潜心修学。司马光在收了这个脾气执拗的弟子后，传授给他的却只有一个简单的“诚”字，不教经传，只教做人修身，要求不说假话、不打妄语。

宋神宗去世后，9岁的宋哲宗继位，其母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推荐刘安世出任秘书省正字，把他从地方调到了中央。后来，吕公著任相，高太后向他征求谏官人选，吕也推荐了刘安世，任命他为右正言。右正言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因为它是以规谏皇帝、弹纠百官为职责而显得异常敏感和重要，宋代选拔谏官也历来严格，既要求品学兼优，也要求廉洁正直。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刘安世在朝中的口碑和品行。

弹臣谏帝的“殿上虎”

宋神宗时代以来，朝廷大臣因裙带关系照顾子弟亲友出任要职的现象比较普遍，刘安世向高太后上书说，近世以来，大臣子弟亲友高官厚禄者屡见不鲜，祖宗确立下来的好制度，如今不复存在。他列举了文彦博等七位大臣的子弟亲友授予要职的具体情况，而这七人个个都是曾经为数位皇帝服务过的重臣。

枢密院事章惇的父亲在世，却用儿子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事情暴露后仅罚铜十斤了事，刘安世认为惩罚太轻，以不孝之罪，多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办。

刘安世的忠直，让高太后十分欣赏，她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像刘安世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在朝廷。”不久，便提拔刘安世为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后又重任为左谏议大夫。

刘安世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面对给予他知遇之恩的太后和皇帝宋哲宗时，他依然故我，仗义执言。有一段时间，民间盛传宫中重金征聘奶妈。刘安世奇怪了，14岁的皇帝征聘奶妈做什么？他猜想宋哲宗可能是以征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

于是，刘安世上了一奏章。并在朝会上对高太后和宋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后保佑陛下身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要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亲信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努力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

刘安世说得宋哲宗很惭愧，高太后赶紧打圆场说：“此乃谣言，卿误听了。”此后，再没发生过征聘奶妈之举了。

刘安世出任谏官多年，正色立朝，秉持公道。他经常在朝堂之上与皇帝争辩，皇帝发怒时，他就手执书简一边站着。等皇帝怒气稍解，他又上前争辩。旁观的同僚、侍从们常常吓得冷汗直冒，无不敬畏，纷纷称他为“殿上虎”。

晚年处境凄凉

元裕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起用章惇为宰相。

章惇是有仇必报的人，刘安世在谏官任上，曾多次弹劾章惇，因此，章惇收拾起刘安世来，简直是往死里整。章惇任相后，把刘安世贬官至岭南英州，后来又贬往梅州。职务越贬越小，人也越贬越远。

后来，宋哲宗的第一任皇后孟氏因故被废，宋哲宗扶正宠妃刘氏为皇后，章惇又状告刘安世当年攻击征聘奶妈之事，针对的就是现在的刘皇后。他说动宋哲宗下旨，命令人用槛车押解刘安世入京受审。当槛车还在路上，宋哲宗却去世了，他的弟弟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刘安世侥幸躲过一劫。

徽宗前期，曾重新任命刘安世为集贤殿修撰、郓州知州等职务，后来蔡京出任宰相，他也像章惇一样，把刘安世往死里整，连续七次把刘安世流放蛮荒之地，最后发至峡州拘禁监管。这时，刘安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后来政治气候稍有放松，朝廷才为他复职为承议郎，但刘安世不久就去世了，终年78岁。

（2015年第6期《廉政瞭望》晏建怀）

◆评 论

“互联网+”重在行动

“互联网+”行动计划，如火如荼。结合我个人最近“云游布道”的经验和体会，我真的发自肺腑地想说一句：“互联网+”，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当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传统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无论上市与否，无论国有私有，对“拥抱互联网”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但这些传统行业似乎还是“听的很多、干的很少”。

事实上，正如我在各种场合开讲的那样，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并不复杂，其关键在于六点：先进技术为支撑、产品建设为根本、强化互联网思维、以用户为中心、一把手工程、拥抱移动生产力。

问题是，相当大一部分的传统行业决策层、管理层听课的时候如痴如醉，但是一旦听完了，却因为各种千差万别的原因止步不前。

就拿“先进技术”来说吧。干航空业的，你没玩过谷歌眼镜和虚拟现实能行吗？干零售业的，你没体验过iBeacon能行吗？干医疗业的，你没考察过以色列的无创血糖仪以及蓝色巨人的沃森机器人医生能行吗？干酒店业的，你不了解喜达屋在Apple Watch上的移动应用能行吗？干银行业的，你不谙熟生物特征识别能行吗？

当然不行。你不掌握“先进技术”就意味着你要“落后挨打”。

很多国企领导告诉我，现在出国考察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也有很多私企老板告诉我，现在经济不景气，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要放在企业内部“抓革命促生产”上。

这其实就涉及另外两个关键点，“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把手工程”。思维的变革是最高境界的变革，这需要企业一把手率先示范，否则，凭什么你做领头羊呢？

当然，抛开“一把手工程”之外，阻碍“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的还来自于多个维度，比如说管理层与执行层。按照“互联网思维”，在“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应该千方百计享受包括淘宝、支付宝、微信这样的“互联网红利”，但是，由于工业软件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或者出于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考虑，“互联网+”的进程被种种借口百般阻挠，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无疑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除了“先进技术、互联网思维、一把手工程”之外，“产品建设、以用户为中心、拥抱移动生产力”也是传统行业可以马上“互联网+”的重要进程，借助“移动生产力”，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可以直接创造与用户连接的机会。以用户体验、用户需求反向驱动产品建设，欧美已经有太多传统行业正沿着这个方向在“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上高歌猛进了，比如说梅西百货，比如说通用电气，比如说维珍航空，人家没说“互联网+”，但是人家真真切切地在“互联网+”。

我想，这是一个一路高歌的时代，也是一个颠覆的时代，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李克强总理都说“政府要自我革命，忍痛也得下刀”，传统行业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自我革命”呢？（2015年4月22日《新京报》李易）

◆文 坛

远去的“江村”风景

在给学生开列的参考书目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总是排在前面，仅次于林达的法律系列故事书。“江村”是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实地考察过的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是他写作《乡土中国》的模本。

费孝通先生对开弦弓村调查的时间是在1936年的7月到8月间。这个时期，“江村”“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由于熟悉各种传统规则，并把这些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所以人们不用问理由，理所当然地就认为应该加以遵守。遇到纠纷时，人们也一般不会去打官司，而是由乡村里的“长老”等权威进行调解，而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长老在“评理”中可能会把双方都骂一通，依着他认为是“应当”的进行处理，最后的结果则是双方时常就“和解”了。

其实，就在费孝通先生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种迫人的变革已经开始，他也感受到江村那种基于人与人的熟习而培植和维护的乡村秩序的规则，已经不敷适用。在这样一个封闭而比较单一的社会中，养成了对新成员、新合伙人和新生活方式的排斥，这种排斥既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生意上的，它固化和简化了人们的生活需求，限制和堵塞了财富增值的其他路径，其结果自然是普遍的不富裕甚至是均一化的贫穷。

在当下的中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们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农村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像媒体报道的陕西“两个人的村庄”虽有些夸张和极端，却也勾勒出了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换的大致轨迹；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的迁徙，他们暂居或定居在许多类似“江村”的城镇，生活在同一社区，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快速变迁的社会里，人们的交往规则和纠纷解决模式也在必然发生改变，这就需要有法律在场，来增加陌生人之间交易的可能和安全，毫无疑问，这也是当下亟须推进法治的理由之一。

我们熟悉的无数个“江村”正在远去。不过，无论在“两个人的村庄”，还是在繁华的都市，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找到熟人社会的影子。正像我们经常会回眸逝去的童年一样，重情、重义、修德、守信，致力于生活的和谐与绵续，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怀想。（2015年4月18日新华网 马建红）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010）62809949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6228 62805368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